



“社会空间视野的上海纪事”书系

于海 主编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

From Model Community to Monumental Site

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A Workers' Village through History

杨辰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社会空间视野的上海纪事”书系

于海 主编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

From Model Community to Monumental Site

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A Workers' Village through History

杨辰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From Model Community to Monumental Site: A Workers' Village through History by YANG Chen
Copyright © 2019 by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First publish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
From Model Community to Monumental Site: A
Workers' Village through History / 杨辰著. — 上
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9
(社会空间视野的上海纪事书系 / 于海主编)
ISBN 978-7-5608-8539-1

I. ①从… II. ①杨… III. ①城市社会学—研究—上
海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8577 号

本书由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书中部分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51778434, 51608365)
部分图片承蒙上海图书馆、解放日报社惠允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杨辰 著

出品人 华春荣

责任编辑 江岱 助理编辑 周轩 责任校对 徐春莲 装帧设计 张微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安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85 000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8539-1

定 价 6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

为重建中国作出贡献的新村工人

“社会空间视野的上海纪事”书系

总序

于海

上海研究是国际显学，但从来是上海历史研究一枝独秀，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品质的佳作不断面世，不乏后来被尊为经典的作品。题材广泛，无所不包，如族群（《上海苏北人》）、政治（《上海罢工》）、经济（《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色情业（《上海妓女》《危险的愉悦》）、租界（《清末上海租界社会》）等。上海以港兴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迅速崛起为中国最繁荣的通商口岸，历史的地理品性格外凸显，透过五花八门的历史主题，我们不难发现一条空间化的叙事逻辑。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以小说《魔都》一书成名，“魔都”也成为上海人自我认同的城市名号。上海何以被称为“魔都”？在笔者看来，因为上海的“魔性”。魔性来自哪里？来自因租界而形成的两个不同性质的空间共存于上海的局面，“这‘两个不同性质的空间’（即租界和县城）相互渗透、相互冲突的结果，使上海成为一座举世无双的‘兼容’的都市，由此而产生了种种奇特的现象”¹。一本20世纪30年代用英文出版的上海旅游指南上赫然写道：“上海是一个充满了美妙的矛盾与奇异反差的国际大都会。她俗艳，然而美丽；虚荣，但又高雅。上海是一幅宽广壮阔、斑驳陆离的画卷，中国与外国的礼仪和道德相互碰撞，东西方的最好与最坏在这里交融。”²但有时说奇特、奇异还远远不够分量，当时名义上上海还是清王朝的辖地，“但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国际社会’；中、英、法三方都无法在此实行全面的管理，这也使得上海的政治束缚较少，专制、钳制较弱，大大有利于贸易和经济的自由发展”³。上海城市空间的中心与边缘的权力格局，正是在租界与华界的历史划分中形成的，并一直延续至今。把上海发展的地理基因讲得最为直白的是美国学者墨菲，笔者已在著述中多次引用，这里不妨再做一次文抄公：

上海的经济领导地位在地理上的逻辑，很可能会证明比任何政治论据更加强大有力，更加令人信服。大城市不会偶然地出现，它们不会为一时的狂想所毁灭。地理上的事实曾经创立了上海。⁴

地理学家明白，“针尖上不会发生什么”，地理的事实创立了上海，也创造了上海的族群。韩起澜关于“苏北人不是在苏北的人，而是在上海才成为苏北人”的断言，清楚地表明族群的形成不只是一个社会的叙事，更应是一个社会地理的叙事。

以上从海外上海学的历史文本引出的话题，指向的正是本丛书标榜的“社会空间视野的上海纪事”。“上海纪事”既是纪事本末，更是当代叙事，本丛书立志以上海研究的历史经典为范，聚焦今日上海，创出当代的都市“竹枝词”。“社会空间视野”是理论、是方法，这一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所创并强调的观点，可由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一段话来表述，

生产的各种社会关系具有一种社会存在，但唯有它们的存在具有空间性才会如此；它们将自己投射于空间，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否则，它们就会永远处于“纯粹的”抽象，也就是说，始终处于表象的领域，从而也就始终处于意识形态。⁵

社会关系的空间性存在，可视为“社会空间视野”（social spatial perspective, SSP）的要义；而空间实在的社会性塑造，也是SSP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两句合起来，构成我们对本丛书主题之方法论的理解。本丛书或将延续经年，但无论前景如何，我们的主题必须体现上海研究的社会空间取向，以下丛书的选题说明本丛书的学术旨趣。

例一是上海工人新村纪事。在原有八十平方公里建成区的外缘兴起的工人住区，既是当代上海的一个空间事件，也是社会主义上海的一个社会事件；工人新村的居民不是通过市场走入新村的，而是在模范员工的竞争中由代表国家意志的单位选拔出来，成为新村居民的。一场体现新社会政治和道德标准的社会分层，与表征国家主人公身份的空间地位，通过工人新村结合起来。在上海人的记忆中，第一个工人新村——上海曹杨一村，就是优越住宅和优越社会地位合一的同义词。历经六十年变迁，今日的劳模二代，仍然住在曾经荣耀的父母留给他们的新村里；昔日的模范住宅已经破落，因为新村作为具有“红色基因”的文物，需要整体保护，从而失去通过城市更新带来住房改善的机会。他们可称为此轮社会变迁的“落伍者”。除了研究者外，甚至没有人听闻“劳模二代”的说法，他们这一代人，完全没有了与其父母匹配的社会地位和声望。通过工人新村的纪事本末，我们不

难一窥六十年来社会分层的消息。

例二是上海商街主题。提到商业，稍稍熟悉上海历史的，马上会在脑际跳出“以港兴市”四个字，这分明说，地理和商业是上海繁盛的两大因素。上文提到的墨菲，除了说地理逻辑比任何政治论据更强大，还说商业的重要性更甚于工业⁶；但墨菲所言的商业，全在埠际和国际贸易，并无坊间的零售商业，现代上海兴起于通商，若不谈社区商业，说商业为上海发展动力就不全面。上海开埠时人口约20万，100年后约500万。学界公认，人口规模为上海崛起的关键，但若没有城市零售商业的跟进，数百万的移民无法安顿，日益扩张的城区亦无法玩转。玩转外滩的，或是中外银行的大亨和交易所的高手，但让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移民城市运转起来的却是密布在其大街小巷的零售店铺和生活在弄堂里的普通上海人；移民、商铺、商居混合的街坊格局，这是百多年前移民落脚上海的故事，不也是今日移民落脚上海的故事？如果套用列斐伏尔空间三重性概念：第一，商街是一个结构化的空间（structured space），这是指商业和居住在空间构造上的内在勾连，是商居一体的社会空间，其商铺的创设本就源自社区生活的日常需要，而商铺的创业者多半也是社区的居民。这样，商街并非一列浅浅的、单纯的商业店面，而是商居交织的网络并发生稠密互动的社会空间。第二，商街是一个家居的空间（lived space），家居性不仅让商业获得持续的购买需求，也为“居改非”提供了新增商铺所需的资源，关键是上海的社区商业原本就是起源于住区。正是由于起源于生活的空间，所以不仅昔日能有兼具就业和居住的经济型的里弄开店，而且也使今日的商铺创业成为移民落户上海的方便途径。最后，商街是一个想象的空间（imaged space），社区商街不仅具有物理的（商居混合）和社会的（生活世界）的维度，同样也具有想象的和象征的维度。例如，无论是对业主还是对消费者或游客，田子坊都是一个充满文化意涵和象征价值的景观地，而非单纯的商街，因为对业主来说，他们清楚他们的生意一半卖的是东西，一半卖的是空间，确切地说是被想象的空间；而对上海本地天性恋旧的中年以上的人士来说，田子坊就是安顿他们少年、青年记忆和弄堂情结的地方。

以上只是依据社会空间理论对本丛书的部分选题所做的简略分析，它无意取代城市研究的其他理论和方法，但我们愿意重温列斐伏尔的告诫，“低估、忽视或贬抑空间，也就等于高估了文本、书写文字和书写系统（无论是可读的系统还

是可视的系统），赋予它们以理解的垄断权”⁷。必须强调的是，列氏说的空间，从来是勾连空间的社会性和社会的空间性的辩证论说。以列氏话语分析产业空间，能看到的绝非只是空间中的产业形态，更要关心空间的权力关系和互动格局。而如此这般的（产业）空间本身，也并非产业或机器的容器，社会空间视野的分析，恰恰是把重点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以上海田子坊为例，空间的生产不只是创造了一个文创产业，更是生产出一组象征空间和空间叙事，不同的精英合力参与了这场空间语言的改写：艺术精英创造了一个田子坊的空间传奇，并以“田子坊”之名将一件俗事变成一个圣物；学术精英的话语则为田子坊建构一个意义丰富的叙事，正当性叙事——历史街区保护的正当性、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把田子坊只说成一个文创园区，是它的意义狭隘了，确切地说，是它的社会空间的多重面向丢失了。

我们的议论是从声誉卓著的上海历史学研究开始的，从时间的叙事，我们看到了空间的逻辑。但本丛书并非只是空间文本，“纪事”的标题已经显示我们的抱负，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丛书的主题，已选的和待选的，无论是工人新村、商街、创意园区，还是娱乐空间、滨江岸线、里弄世界等，都力求以历史（纪事）为经，以场所（社会空间）为纬，以历史意识和空间敏感，来书写当代上海的春秋，美国学者苏贾下面的话，代表了丛书对“社会空间视野的上海纪事”的认知和定位：

存在的生活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处于历史的构建，而且还创造性地处于对人文地理的构筑，对社会空间的生产，对地理景观永无休止的构形和再构形：社会存在在一种显然是历史和地理的语境化中被积极地安置于空间和时间。⁸

1. 转引自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317页。

2. *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 The 1934-35 Standard Guide Book* (Shanghai: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5), p.43. 译文引自刘香成、凯伦·史密斯编著《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金燕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前勒口。

3. 唐振常：《近代上海繁华录》，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3，第111页。

4.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249页。

5. 转引自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94页。

6.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203.

7. 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93页。

8.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16页。

目次

引言	1
----	---

上篇 工人新村——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史

第一章 工人新村——一段社会史缩影（1949—1995年）	21
1. 1949年以前的上海工人群众	22
群体的形成 / 社会特征 / 居住状况	
2. 工人新村的缘起	30
1949年以后的上海工人阶级及其住房状况 / “新村”与“新村主义”	
3. 上海工人新村的建造历程	34
开端 / 扩张 / 停滞 / 恢复	
第二章 公房体系的构建与居民管理	45
1. 从房地产开发到公房体系	45
1949年以前的上海房地产市场 / 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 / 城市公房体系	
2. 从保甲到居委会	53
1949年前上海的基层社会组织 / 工人新村里的居委会	

中篇 工人新村的空间与社会建构——从1952年至1990年代

第三章 曹杨新村——上海社会主义空间样本	65
1. 选址	67
“先生产后生活” / 远离旧市区的“新世界”	
2. 住区规划	76
“如画的风光” / 等级化的空间结构 / 集体主义生活	

3. 户型设计	85
标准化 / 差异化	
第四章 “模范社区”——第一代新村工人的身份建构	93
1. 国家赋予	94
单位筛选 / 职工评选	
2. 社会宣传	98
对外窗口 / 文艺作品	
3. 自我认同	101
对单位工作的强烈责任感 / 对新村空间的认同 / 对邻里关系的维护	
第五章 失落的一代——第二代新村居民的曲折经历	115
1. 生活轨迹	115
上山下乡 / 返城 / 新的困难 / 国企改革与职工下岗	
2. 社会身份的丧失与家庭关系的重建	125
国家与个人命运 / 新村工人与单位 / 家庭关系	
3. 回归社区生活	132
对新村的依附 / 对住房的依附	
下篇 社会转型中的工人新村——1990年代后	
第六章 居住流动与社区融合	137
1. 居住流动的背景	138
1990年代末以前的单位制社区 / 199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变革	
2. 居住流动的机制	142
流动的成因 / 流动的方式 / 流动的条件	
3. 流动的结果——社区融合	152

第七章 旧城改造中的纪念地	157
1.1990年代末以来上海城市发展的新背景	158
土地与住房制度改革 /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公房的萎缩 / 旧城改造 / 遗产保护意识与“纪念地”的设立	
2. 纪念地的尴尬	163
发展滞后 / 困难社区 / 丧失改造权	
3. 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曹杨一村的保护与改造	171
地方政府 / 街道办事处 / 居委会 / 新村居民	
结语	177
附录	
A 访谈信息表	183
B 当代上海与曹杨新村大事记	187
C 上海房地产制度改革大事记（1979—2010年）	189
D 1980年代以来上海市动迁安置政策演变	190
参考文献	191
索引	207
后记	209

插图与表格列表

图 1-1	肇嘉浜边的棚户	28
图 1-2	杨树浦路裕丰工房 (1930 年代)	28
图 1-3	愚园路渔光村工房 (1936 年)	29
图 1-4	中山路平民村	29
图 1-5	上海市新建平民村内景	30
图 1-6	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中译本书封 (1927 年)	33
图 1-7	《新村建设》书封 (1930 年)	33
图 1-8	上海市区各类居住房屋的占比变化 (1950—1978 年)	35
图 1-9	上海工人新村与全市住宅历年建设情况 (1951—1995 年)	36
图 1-10	上海工人新村建设 (1949—1953 年)	38
图 1-11	上海工人新村建设 (1949—1958 年)	40
图 1-12	上海工人新村建设 (1949—1978 年)	40
图 1-13	上海工人新村建设 (1949—1995 年)	42
图 2-1	生活性组织: 托儿所	60
图 2-2	小学生做集体操、写作业	60
图 2-3	文化组织: 棋牌社与合唱团	61
图 3-1	曹杨新村区位图 (1952 年)	67
图 3-2	曹杨新村总平面图 (1980 年代)	68
图 3-3	上海工人新村与工厂的分布及规模 (1978 年)	71
图 3-4	普陀区工业发展和新村建设 (1949—1990 年)	72-73
图 3-5	上海棚户区分布 (1949 年)	74
图 3-6	曹杨新村规划总图 (1951 年版)	75
图 3-7	曹杨新村鸟瞰 (1957 年)	76
图 3-8	曹杨新村村内院落 (1950 年代)	77
图 3-9	曹杨新村居民纳凉场景 (1950 年代)	77
图 3-10	“邻里单位”图解	78
图 3-11	《建筑月刊》书影 (1934 年第 2 期第 21 页)	79
图 3-12	曹杨新村住宅区规划结构示意图	82
图 3-13	曹杨一村住宅室内及家务院生活场景复原图 (1950 年代)	84
图 3-14	曹杨新村托儿所和集体食堂	85

图 3-15 曹杨一村集会广场复原图 (1950 年代)	86
图 3-16 曹杨新村四类标准户型及其分布 (1952—1978 年)	88-90
图 4-1 欢送居民入住曹杨新村 (1952 年)	99
图 4-2 印度代表团参观曹杨新村	100
图 4-3 苏联代表团参观曹杨新村	100
图 4-4 画册《曹杨新村》与诗集《曹杨新村好风光》(1953 年出版)	102
图 4-5 电影《今天我休息》(1959 年上映)中的曹杨新村	102
图 4-6 曹杨新村的公共服务设施	109-110
图 4-7 曹杨新村全景 (1960 年代)	111
图 6-1 被占用的院落与天井	146
图 6-2 顶层的阁楼	146
图 6-3 被侵占的走道	146
图 6-4 新村住户住房变迁	148
图 6-5 新村住户 (CY001) 为两代共居搭建的阁楼	150
图 7-1 上海动迁安置房基地位置 (1997 年和 2004 年)	162
图 7-2 曹杨地区三类不同年代居住小区分布	164
图 7-3 老化的木制楼梯	166
图 7-4 脱落的墙皮与外墙标语	167
图 7-5 “迎世博”外墙粉刷前后对比	169
表 1-1 上海工人的数量 (1894—1949 年)	24
表 1-2 上海工人的行业分布 (1949 年)	24
表 1-3 上海工人籍贯的行业分布 (1930 年代)	26
表 1-4 上海工人的住房情况 (1949 年)	27
表 1-5 上海市区各类居住房屋实有建筑面积 (1950—1978 年)	35
表 1-6 上海工人新村历年建设面积 (1951—1995 年)	36
表 1-7 上海住宅建设投资和人均居住面积 (1950—1995 年)	43
表 2-1 上海城市私有房屋的变化情况 (1950—1978 年)	49
表 2-2 上海城市住房建设各渠道投资比例 (1950—1995 年)	50
表 3-1 普陀区工厂和工人新村的增长情况 (1949—1990 年)	71

表 3-2	居住空间规模的等级化	81
表 3-3	公共服务设施规模的等级化	81
表 3-4	上海工人新村的标准户型 (1952—1970 年)	88
表 3-5	不同行政级别的办公与住房面积标准 (1955 年)	88
表 4-1	“两万户”住宅分配表 (1952—1956 年)	95
表 4-2	上海申新九厂住房分配候选人来源 (1952 年)	97
表 4-3	曹杨一村部分第一代居民在 1950 年代的家庭收入	98
表 6-1	曹杨一村历年人口统计 (1996—2010 年)	141
表 6-2	本地户籍与外来居民的年龄构成 (2010 年)	141
表 6-3	本地户籍与外来居民职业结构特征 (2010 年)	141
表 6-4	曹杨一村 44 位受访者基本情况 (2010 年)	142
表 6-5	曹杨新村本地与外来居民居住流动机制比较	154
表 7-1	曹杨一村的居住状况 (2010 年)	166
表 7-2	曹杨新村合用户公共厨卫面积 (2010 年)	166
表 7-3	曹杨一村困难户统计 (2010 年)	168
表 7-4	上海土地财政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 (2005—2010 年)	172

引言

提起“工人新村”，上海市民不会陌生。这些建于20世纪50—90年代市区边缘、近郊或远郊，服务于国有企业职工，由3~6层砖混结构住宅构成的行列式小区，是今天上海最具特色的住区类型和城市景观之一。虽然工人新村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退出了住房建设市场，不少第一代新村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也被拆除，但工人新村依然是上海城市空间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新村产生、发展、停滞、衰败以及更新的过程（1949—2010年）深深地嵌入上海这60年的空间发展与社会变革之中，本书即是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与反思。我相信，工人新村是理解20世纪中叶至今中国城市现象的独特切入点，新村经验对于当下的公房建设与社区治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变革中的上海工人新村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中心，也是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基地。1949年以后，这座曾经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开始了它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政府意识到，对上海的改造“是中国革命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历史标识，也是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城市站得住脚，并长远掌握政权的焦点所在”。¹从1950年代开始，一系列的改造在上海付诸实施：私人企业的公私合营，私人住房的国家经租，建立单位制²，推行户籍制度，废保甲成立居民委员会，支援“三线”，人民公社化运动，上山下乡运动，等等。从此，私营工厂改造为国有企业，房地

1. 庞松，1997：284—312

2. “单位制”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城镇地区最具特色的组织制度。所谓“单位”，是在城镇地区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其典型形态是城市社会中的党和政府机构（行政单位）、国有管理及服务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李路路，2013：11）

产市场被“统一投资、统一建造、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公房体系所取代，流动混杂的基层社会也被纳入居委会的管理范畴。这一时期的上海，尽管缺少中央财政支持而未能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¹，但激进的改造措施依然通过“为数不多的空间拓展”——工人新村计划，在城市中留下了重要的印记。

1990年代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上海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龙头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快速城市化带来房地产业的繁荣，新城开发和旧城改造成为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的两个重要引擎。与此同时，国企改革、单位制解体、住房私有化改革导致新村的式微。新村工人的下岗、再就业、社会融入，以及工人新村的保护与改造也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与城市更新的重要议题。

正如列斐伏尔²所说，“一场革命，如果没有产生出新的空间，那么它就没有释放其全部的潜能；如果只是改变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体制，而没有改变生活的话，它也是失败的。真正的社会变革，必定会在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中体现出它具有创造力的影响。”³工人新村也是如此。无论是195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大开发，外部环境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对微观社区产生剧烈的影响。因此，研究一个工人新村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从光荣到褪色的过程，可以让我们窥见上海——这座复杂又充满魅力的大都市——60年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

关于“工人新村”

本书中的“工人新村”指1949—1978年由政府出资，按照统一投资、统一建造、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原则，为工人群众建造的公共住宅。这里的“工人”特指1949年以后的国有企业职工，而“新村”的概念则较为复杂。实际上，新村不是

1. 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上海并未获得新政府的信任，这一时期国家的发展战略是限制东部沿海大城市，积极发展内陆城市。上海不仅丧失了部分经济和商业活力，还为内陆发展贡献了大批科技专家和技术工人。更重要的是，上海每年要将大部分地方性收入上缴中央，剩余部分的96%还要投入在地方生产性领域。对于城市建设等生活性投资、特别是住宅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则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一矛盾现象（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与城市空间的相对稳定）是理解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城市发展的关键。（白吉尔，2005）

2. 列斐伏尔（H. Lefebvre, 1901—1991），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开创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而著称，关于城市权和空间生产的概念也有重要影响。

3. Lefebvre, 1991: 54

1949 年以后的新事物，这一概念早在五四时期就从日本引入中国，并成为流行于新青年之间的一种思潮。其本质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即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推广共同劳动和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天国。从 1920 年代中期开始，在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了以“村”“新村”“模范村”为名的新式里弄、公寓里弄和花园住宅，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平民村”。¹1949 年以后的“工人新村”与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新村”的联系和区别在于：不同时代的新村都希望通过“清洁、卫生、田园风光”的空间意向，创造一种与过去不同的居住形态和生活方式；但工人新村的“新”寄托了更多的社会主义理想，代表着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的公共住房在投资、建造、分配、管理方面一整套高度集中的“生产方式”，以及单位和居委会对工人群体的双重组织和管理模式。可以说，工人新村不仅是一种居住类型、一种空间实践，它也是一种生产制度、治理手段和生活方式。

相关文献

工人新村是 1949—1978 年期间上海（以及中国其他一些工业城市）最主要的公房类型，但国内对于工人新村的研究却并不多见。²第一次较为集中的学术讨论出现在城市大开发时期（2003 年前后）的文化研究和建筑师著作中，如罗岗、李芸从文化角度对上海工人新村的价值和象征意义的探讨；³付晨和丁桂节对工人新村的特征和文化意义的分析等。⁴这一阶段的思考主要是基于文学文本或建筑空间，几位学者虽然意识到工人新村的价值，但倾向于把工人新村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或住宅类型，尚未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社会身份与认同”（社会学视角）、“城市发展”（城市视角）进行系统地分析，尤为欠缺对新村历史

1.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新村”有地产商建造的、代表“坚固、清洁、新式、美观”的中产阶级住宅，也有慈善机构和政府建造的“解决社会人士住的问题”的平民福利事业。（李颖春，2017：16—20）

2. 除了汪定曾（1956）和王硕克（1962）两位建筑师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项目介绍之外，“工人新村”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未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截至 2017 年，在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和 CSSCI 两类来源的文献中，以“工人新村”为主题有 28 篇，以“工人新村”为篇名的仅 8 篇。

3. 罗岗，2007：91—96；李芸，2006：105—112

4. 付晨，2004；丁桂节，2007